

自由社会的精神高度

——读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唐士其

这部出版于 1987 年的著作,有两个中文译版,标题分别译为《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和《美国精神的封闭》,作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已于 1992 年去世。关于该书,国内外有大量的介绍与评论,本文不避重复之嫌,主要原因是书中批判的一些美国社会文化现象,正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在中国重现。因此,阅读这部著作,可以为我们的自我反思与批判,提供某种不可替代的坐标。

一、相对主义与价值抉择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批判的首要目标是价值相对主义。这种思潮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布鲁姆就此表示,“有一件事情是一位教授可以绝对肯定的,那就是几乎

每一位刚进入大学的学生都相信,或者表示相信真理是相对的”。^①

在本源上,西方思想的基本特点是理性主义的一元论。在古希腊,哲人“教导的善的生活与正义的政体不承认民族、种族、宗教与气候的差别”,^②而这种对普遍性与永恒性的追求恰恰是哲学的本质所在,它与相对主义格格不入。所谓相对主义,乃是西方思想在近代所发生的嬗变的产物,或者说是近代启蒙思想的某种反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卢梭便是这种相对主义的第一位代表人物。

具体说,从马基雅维利开始,西方主流思想家采取了一种与古典传统截然相反的立场,不再从人的精神维度,即施特劳斯所说的“自然正当”,而是倾向于从一些基本的物质欲望,比如维持生存的欲望出发对人性加以说明。

• 唐士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①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London: Penguin Group, 1987, p. 42.

② *Ibid.*, p. 153.

卢梭不满足于对人性如此低俗的理解,同时也不相信人凭借自然物欲能够臻于完善,因此设计出一套特殊的政治社会制度,作为使人超越其自然属性、从单纯的动物提升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熔炉。问题在于,卢梭的政制设计不像古典传统那样,立足于人的自然本身,而是为现代文明的思想 and 物质成果保留了足够多的空间,而文明又是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结果,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需求和欲望,以及满足这些需求和欲望的手段,具有多样性,所以它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这样,把文明即政治社会生活作为人性的保证,人性也就成为一个复数概念。正如施特劳斯所说,卢梭试图在现代文明的水平上重返自然;或者如布鲁姆所说,他是要在自然与文明之间寻求某种妥协,因此文明的概念已经击碎了人性的统一。从卢梭开始,对人的普遍化理解开始受到置疑,政治或者文化成为把不同人群分离开来的樊篱。

相对主义发展的第二步是由尼采完成的。尼采一方面对现代社会的价值丧失深感忧虑,另一方面又秉承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启的传统,相信价值创造并非理性能力范围内之事。这种观念,使尼采把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的固有因素视为价值的源泉,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的倾向。布鲁姆指出,按照尼采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

“人”这个概念变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因为“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人”。^①

相对主义自然意味着多元主义,意味着个人有权在不受他人干预的情况下随意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人们相信,“令人尊敬的、可以达致的崇高不再取决于寻找或者发现善的生活,而是可以通过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得到,这种生活方式不只一种而是有很多,它们之间毫无可比性。”^②这种态度,在美国被视为“开放”的体现。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价值选择也都堂而皇之地被冠以“文化”之名,“像吸毒文化、摇滚文化、街头小混混的文化,等等,而且不带任何歧视。没有文化就是文化。”^③

相对主义对一切选择一视同仁,要求人们放弃价值问题上的理性与道德判断。在相对主义者看来,具有真正信仰的人才是最现实的威胁,因为历史上的战争、迫害、奴役、仇外、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无一不是人们自以为是的结果。因此,关键不在于纠正错误获得真理,而在于根本就不要再自认为已经掌握真理。于是,世界上不再有善与恶,有的只是不同个人的不同选择,或者说只存在不同的善而没有恶。“只要不是法西斯主义,任何事情都没问题。”^④

在为社会带来更多宽容的同时,相对主义也为个人和社会同时带来了极

①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203.

② Ibid., p. 144.

③ Ibid., p. 184.

④ Ibid., p. 151.

为消极的影响,布鲁姆更注重的是后者。当相对主义本身成为终极原则的时候,道德便降低为“文明人”相互交往的礼仪而不再是个人自律的要求以及崇高的人格标准。由于任何选择在道德上都被赋予同等的价值,因而“不仅行动的选择性变得相当枯竭,思想的选择性也流于贫瘠”,人性随之变得肤浅而空洞。^①

布鲁姆异常深刻地发现,由于相对主义拒绝善与恶的判断,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的社会交往只能退而求其次,以诚实或者虚伪作为替代性的标准:“不管你可能有多大的罪恶或是多么的无耻,只要你在这上面是真诚的,你就会被净化了。”^②在这样一种道德背景下,人们宁愿宽容“真小人”而拒斥“伪君子”。他们忘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伪善者内心深处毕竟还保存了某种尚未完全泯灭的是非之心。就此而言,人们对“真小人”的赞赏,只能表明他们自己已经对道德失去了基本的信念。但如果一个社会全是“真小人”,人们以赤裸的欲望彼此面对之时,这个社会也就回复到洪荒时代了。

相对主义最终将瓦解任何一种人类群体,因为当人们不再拥有共同目标或者公共善的观念之时,社会契约便无从谈起。几年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著作《我们是谁?》恰恰表达了这方

面的担忧:在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是否还存在美国的“国家特性”?美国是否会因此走向分裂?除此之外,布鲁姆还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的危险性,即一旦人们失去对价值问题的理性判断,那些非理性的价值选择方式就会趁虚而入。“韦伯对现代处境的诊断要求激进的治疗,而魅力型的领袖就是他开出的药方。”^③希特勒这位“魅力型领袖”给德国相对主义者带来的教训,至今仍然值得人们汲取。

布鲁姆相信,即使人们不能最终断定哪一种价值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也不能放弃对价值问题的理性判断;而且不同价值之间的对抗乃至冲突,只要被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对健康的社会生活、对每一个人道德上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价值问题上的对立与冲突要远胜于对不同价值的无原则承认、同时对自己的价值选择回避任何理性反思的态度。他承认,只要人们对不同价值进行判断,就难免各种各样的偏见,但是因此而放弃理性的权威,“恰恰放弃了可能克服人类偏见的工具”。^④换言之,偏见乃是思想必要的代价。

布鲁姆并不排斥多样性,他认为,对思想自由而言,替代性观念的存在甚至比对法律约束的突破更为重要,但是他坚持,“真正的多样性来自于终极目

①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张辉选编,秦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② 同上,第346页。

③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213.

④ *Ibid.*, p. 40.

的上的原则性差异”,^①是严肃的思考与信念的结果。因此,“将焦点放在多样性本身上面是自欺欺人。因为一种崭新的和严肃的生活方式要能产生并维持下去,它的创立者就必须相信它的真理性和它优于其他选择;他们不可能认为想要的东西就是多样性。这种追求绝不会是对多样性的追求,而必然是对真理的追求”。^②

因此,真正的多样性乃是不同价值的追随者在理性基础之上忠实于自身选择的结果,但这种忠实并非盲从,因为它要求人们认识自身选择的局限性,同时对其他可能性保持开放。“真正的开放与探索未知的欲望相伴随,是一种对无知之知。”^③相反,相对主义由于赋予每一种价值以无需证明的至上性或者绝对性,实际上恰恰导致了各种价值的绝对封闭,因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交流、对话、矛盾和冲突,而且“否认了解善与恶的可能性就压制了真正的开放”。^④这正是本书的标题《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的含义所在。

二、自由及其目的

相对主义之所以在美国社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得到了自由主义的强化。“我们

所了解的那种从密尔到杜威的没有自然正义的自由主义教导我们,我们面临的唯一的危险,就是对萌芽中的东西、新生的东西以及进步的体现采取封闭态度。”^⑤在这种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相对主义成为每一个人不加掩饰地追求个人价值、多数情况下是个人私利的正当化依据。按照美国的流行观念,“真正的相对性并非理论的洞见,而是道德的要求,是自由社会的条件,或者说他们所认为的自由社会的条件”。^⑥

为使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成为可能,唯一的办法是排斥一切关于道德与政治的知识。“解除压迫者武装的有效方法就是说服他们意识到自己对善一无所知。激进民主理论煽动起来的情绪最终把一切限制视为专制与暴政。除自由之外,没有任何绝对。”^⑦布鲁姆以卢梭与罗马哲人奥古斯丁为例强调了现代与古代道德观的对比:“卢梭的《忏悔录》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之不同,就在于前者试图表明,他生来就是善的,他的肉体的欲望也是善的,根本没有原罪这种东西。”^⑧

既然古人相信,人并不能无限制地放任自流,为了追求美德,人必须对自身的某些自然欲望加以约束和限制,那么现代人究竟根据什么样的理由,能够

①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第327页。

② 同上,第326页。

③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40.

④ Ibid.

⑤ Ibid., p. 29.

⑥ Ibid., p. 25.

⑦ Ibid., p. 170.

⑧ Ibid., p. 28.

把一种近乎放任的自由正当化,并且把人生而具有的一切秉性视为至善呢?

布鲁姆认为,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近代西方思想存在一个基本倾向,那就是试图解决人类生活中那些原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在个人自由与美德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政治哲学首先承认人类基本欲望的正当性,其次相信可以通过某种制度设计,在所谓的“经过启蒙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自动达成和谐。洛克的政治思想正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体现:政府源于个人私利又服务于个人私利,而个人对私利的追逐又促进了公益的增进。如此,道德不再成为必须,私欲亦无需受到控制,个人与群体之间一直存在的紧张关系因之而得到缓解。一句话,对美德的要求被置换为对制度的要求。

布鲁姆断然拒绝这种肤浅的“和谐论”,他在另外的地方指出:“霍布斯和洛克让自我利益背负的超过了其所能承担的;在每个关键事例中损公肥私都自然而然。他们制造了许多伪君子。这些伪君子们慷慨许诺却无意践行,假意关心他人实则图谋一己之私;利用他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却也因此扭曲自我。市民社会不过成为一个角斗场,人们在此角逐权力、争夺对财富,尤其是对人的控制。”^①当然,卢梭早就敏锐地捕捉到了私利与公益之间那种被掩饰的矛盾。他发现:“个人的自我利益并不足以确立共同的善,而没有这

种共同善,政治生活就没有可能,而人在道德上也将变得可鄙。”^②从根本上看,自由政体恰恰需要其公民对个人自由施以某种约束,只有专制与僭政才会容许无限制的放任。因此,卢梭采取了一种与霍布斯和洛克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深信,真正的政治共同体必须建立在对个人的自然欲望加以克服的基础上,必须使每一个人都从存在的意义上依赖于社会的其他成员,使他如果“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③

除了洛克式的“和谐论”之外,自由主义还有另一种版本即进化论,它以英国思想家密尔为代表。这种理论把自由视为人类精神进步的必要条件,认为不同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并存与竞争是真理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布鲁姆对这种自由主义也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密尔式的乐观主义实际上没有任何依据,而且也不为美国的立国者们所知。在后者看来,民主政体之下,有些观念仅仅是被容忍而非得到尊重,另一些观念则必须遭到制止。对不宽容就没有宽容可言。

与上述两类自由主义者不同,布鲁姆在自由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自由之所以成为一种人类倍加推崇的价值目标,只因为它有助于理性探讨无限制的发展,有助于人类精神与道德的完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

①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第228页。

②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189.

③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修订第三版,第51页。

对自由本身的限制。如果说自由主义的经典公式是“自由只能因为自由被限制”的话,那么布鲁姆的公式就是“自由必须因为理性和道德受到约束”,而只有体现人类尊严的道德自律,才是自由的本义所在。

布鲁姆感叹,从密尔之后,在西方社会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位有影响力的、在道德立场上捍卫自由的思想家。无论在学者还是普遍民众的观念中,自由主要是从消极的意义上得到理解。这一点通过伯林的思想典型地体现出来,即自由从根本上说是让每一个人进行不受干预的自主选择(消极自由),而非通过对人的动物性自我的改造与提升而实现的精神的自由(积极自由)。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希望为自由或善的生活提供条件,但它却不能规定自由的运用或界定善的生活”。^①

其次,自由及其目的,即对美德的增进之间始终存在紧张的关系,而在处理这种关系的过程中,教育与强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布鲁姆与施特劳斯一样断定,道德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自愿选择,相反,它只有以某种方式得到政治强制的支撑,才会对那些并不能完全支配自身行为的人发挥约束作用。卢梭就认为,如果没有宗教等约束力量,大多数人并没有能力分辨出他的真正义务;对他们来说,理性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对个人得失的算计。

当然,“以理性与美德之名”进行

强制的主张,正是如伯林那样的自由主义者猛烈批判的对象。布鲁姆并非不了解这一点,而之所以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这种与相对主义相联系的自由主义深深地毒害着人们的心灵。因为当一切选择都以自由之名被正当化的时候,自由本身也就陷入了困境,这被不少学者概括为一个经典的两难问题:自由主义是否赋予自由的反对者以自由?人们在自由民主体制下享受生活,却无法对这种体制提供稍微确定的价值基础。一些自由主义者给出的解释是:人们之所以选择这种体制,只是因为既然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追求能够得到理性的支撑,那么包容一切的政治体制就要比不包容一切的政治体制更为可取。在这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已经无法证明自己。

三、平等,差异以及民主的局限

现代政治哲学及政治体制建立在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基础之上,这种平等是自由变得真实而有意义的前提,否则它只会成为少数人的特权。但是,平等应该保障到什么程度,对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不平等应该如何看待以及是否允许这些不平等得到政治上的体现,却是现代政治哲学中争论不休的问题。

对平等主义进行无限制的扩展,乃至完全无视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是现代自由民主主义的一个明显倾向。布鲁姆指出,在当代美国社会,所

^①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第343页。

有的人、事和情感都被认为具有同等价值,这已经成为一项无可置疑的政治原则,任何看上去与之相矛盾东西都会被视为不道德而受到拒斥,以至于“今天,你不能期望说一句‘布鲁姆不信仰上帝’就从大学中得到太多的回应,但你只消说我不相信人人平等就能够使很多人激动起来”。^①

这种普遍平等的观念来自启蒙主义。启蒙思想与古典政治哲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试图把后者认为只能为一小部分人所拥有的东西扩展到所有人,而且相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仅仅是一种新的科学、一种大众化的教育。然而在布鲁姆看来,这必须以“把教育的含义从对美好事物的体验转变为对个人利益的启蒙”为前提,而在大众被提升到一个平等的高度的同时,“贵族则被压低为普通人,其心理支撑被移除,并且降低他们的品味。”^②

布鲁姆特别提到,卢梭在诸多方面与启蒙主义者存在区别,但在主张人的普遍平等这一点上,他们之间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尽管后者强调“自然的”平等,而前者强调“政治的”平等。卢梭的方案是,通过政治设计,以社会的平等取代人在自然状态下的不平等。当然,对普遍平等的追求也是与相对主义结合的自由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论,因为既然不同价值选择之间没有是非对错、高低贵贱之分,那么赋予它们

平等的地位,就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相信灵魂是各不相同的、彼此冲突的倾向之间存在一种自然的等级,而作为自然替代物的传统也已经被摧毁”。^③

与一般的自由主义主义者不同,同时也深为他们反感的是,布鲁姆尽管不反对人们政治人格上的平等,但他始终坚持个人在道德与智识成就上的区别,而且坚持这种区别必须得到政治的承认和体现,社会必须容忍、并且鼓励人们追求卓越、超凡出众,以此作为人类道德和精神进步的必要条件。如他所说:“努力成为第一并且得到更大的荣誉,这是人的自然倾向,而且经过适当的训练,可以成为灵魂中的伟大力量。”^④

布鲁姆对平等主义的置疑必然会延伸到作为其制度体现的民主制上面,虽然在当代世界,民主几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谁要是反对民主,谁就是全人类的敌人。

事实上,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许多一流的思想家对民主却充满疑虑。他们一方面看到民主作为一种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又担心民主会导致“多数的暴政”、对精英的压制以及整个社会道德与文明水准的降低。但是,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也许是因为法西斯主义给人们带来的惨痛教训、也许是因为冷战中意识

①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第297页。

②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p. 288-289.

③ *Ibid.*, p. 156.

④ *Ibid.*, p. 329.

形态的对抗,民主的正当性突然变得不可置疑。民主的批评者不仅需要学术上的洞见,更需要道德上的勇气。

施特劳斯学派的思想家们一般都以自由民主政体的“朋友”自居,他们的一个共同判断是,现代自由民主制是人类可能拥有的最好政体。但他们同时又都强调,这种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面临各种威胁,而其自身也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它需要批评,也需要完善。

布鲁姆完全认同施特劳斯的观点,认为现代政治体制乃是“建立在一种较低但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① 它既不以公民道德为基础,也不以公益的增进为目标,它立足于个体自保的本能,其全部追求仅仅是使人们免于“暴死”的恐惧。这是一种被极度贬低了的政治。由于它把人最低俗的动物性欲望视为自然,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拒斥伟大与崇高的人和事的倾向。“无论何时何地,民主的永恒特征就是压制任何一种优越性的要求,而不论这种要求出自习俗还是自然,其基本方式是否认优越性这种东西,特别是与统治相关的优越性。”^② 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为了获得平等的感觉而情愿去推翻自由所必需的制度和法律,他们不是要抬高而是要削平,他们对他们强加给卓越者和整个共同体的剥夺满不在乎。”^③ 民主制的雅典不能容忍苏格拉底的存在及其对城邦的讽刺与批判,这一事件典型地

表明了伟人与大众、哲学与城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种冲突是施特劳斯和布鲁姆在政治哲学上最为关注的问题。它表明,哲学要在城邦中生存并引导城邦,就必须学会如何自处;而城邦为了能够接纳哲学的指引,也必须对自身有所调适。布鲁姆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民主政体必须为两类人物保留足够的空间。一类是哲学家,他们是民主的批评者,但也是为洞穴中的人们描绘真实的世界并推动那些能够受其启发者追求真理的人,布鲁姆把他们安置在大学校园中。另一类人则是政治家,他们使政治成为一种艺术而非技术,使民主制能够得到它自身所缺乏的生机与活力。

在此,布鲁姆拒绝近代启蒙主义对政治的理解。后者认为,“只能有一种科学。它在任何地方都一样,而且在任何地方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类似地,从原则上说,也只能有一种合法的政治秩序,它基于科学、通过科学、并为科学而建立。”^④ 布鲁姆指出,这种政治观念由于忽视了政治生活的基本特性即其中充满的机遇及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同时降低了政治家与政治的水准。

布鲁姆强调,政治不仅是民众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政治家慎思和明断的结果,是后者通过政治艺术说服前者接受其决断的过程;只看到前一方面,实际上意味着取消了政治,因此他表示:

①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167.

② Ibid., p. 329.

③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第 335 页。

④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287.

“现代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的消失,而这一点与我们的政治实践大有关系。政治或者消失在亚政治的领域(经济),或者消失在据称比政治更高的领域(文化)之中,而这两者都避开了建筑的艺术,即政治家的慎断。”^①

严格地说,布鲁姆没有提出任何体制性的建议以改善民主制。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忠实于施特劳斯的传统。因为在后者看来,哲学家不仅必须与政治保持距离,而且也不能充任大众的启蒙者和教育者,他只对某些特定的个人表达观念,并通过他们发挥实际影响。这并非因为哲学家的清高,而是因为哲学与政治是两个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的领域。启蒙主义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哲学政治化,又把政治理论化了。布鲁姆认为,哲学家们的作用,将通过大学这一机构表达出来,因为在现代社会,它是能够保证人们的精神独立、推动人们追求崇高与卓越,从而使自由变得有意义、使民主得以完善的唯一的社会机制。

四、大学:自由民主时代 人类的精神家园

布鲁姆强调:“正是为了防止或者治愈民主特有的盲目性,可以说民主社会中大学的存在不是为了创造某种

贵族统治,而是为了民主自身,是为这种体制之下的某些人保留思想的自由,当然,这是最重要的自由之一。”^②为此,大学至少应该具备三项重要功能:一是提升人们的精神高度;二是为社会培养真正的精英人物;三是为哲学提供起码的生存空间。

布鲁姆与一个世纪前的密尔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具有一种使人们在精神追求方面平板化的倾向,而唯一能够与这种倾向相抗衡的,就是教育。他在一篇纪念施特劳斯的的文章中写道:“人是其所处时代及场所中权威意见的囚徒,一切人由此开始,大多数人也在此结束。教育就是从这种束缚中获得解放,就是上升到某种立场,从那里能够看到洞穴。……正是这种可能性构成了人之自由的本质。”^③

因此,大学必须注重对学生的灵魂的教育,而不只是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必须努力寻找学生身上那种使他们向往完善的东西,并且通过对知识的重建,使他们能够自主地追求完善。”^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禁欲主义,因为“感性渴望的与理性后来视之为善的并不必然彼此冲突。教育并非通过说教使孩子放弃直觉与快乐,而是在他们所感到的与他们能够而且应该达致的价值之间提供一种自

①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189.

② Ibid., pp. 251-232.

③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第8页。

④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63.

然的连续性。”^①

布鲁姆提出,为了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必须使他们学会阅读经典著作。只有透过经典,学生们才能发现被流行观念所淹没的东西,感受日常经验中无法获得的体验,才能意识到各种替代性选择的存在,也才能培养一种不安现状的、对社会的批判性意识,并且使他们的“心灵之眼”变得更为敏锐,能够“看到人与人之间、他们的行为与动机之间的细微差别,才能形成真正的品味”,最终“忘却自己偶然的生活,参与到某种永恒的存在之中。”^②

其次,大学必须成为精英人物的摇篮。布鲁姆指出,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大学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向所有人开放的、传播各种专业知识的场所,然而这并非大学的真正使命。虽然大学要培养那些具有更高智识的人,就需要确立多数人不可能达到的成就标准,而且这会刺伤民众的感情,但他仍然坚持“无论是否愿意,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贵族制的。”^③

布鲁姆分析道: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满足于当下社会对大学功能的理解,即通过大学教育获得一技之长;还有一些人可能受到家庭影响或出于个人兴趣,对知识本身表现出某种热情;只有极少数人会以毕生的努力追求独立自主。他认为,大学教育

主要就是为最后一种人而存在的。“他们将成为以最崇高的方式发挥人类能力的典范,他们将主要因其所是、而非因其所为泽被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他们的存在(也许还应该加上没有他们得到的尊重),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是多么的富裕与舒适,也不论它在技术上多么发达或者情感上多么细腻——都没有资格被冠以文明之名。”^④

最后,在高度分工与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大学应该为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整全性思考提供必须的环境。在施特劳斯学派看来,所谓“整全性”的思考就是哲学思考。布鲁姆痛感现代社会各种专业人士在精神领域的分裂:“具有高度伦理精神的经济学家谈论的只是获取,充满公共意识的政治学家寻求的只有党派利益,科学家一方面吁求自由,另一方面却只承认宇宙中的不自由——统治着运动物体的数学规律,这一切表明要为科学提供自我理解,为理论生活提供基础何其困难。”^⑤大学培养出来的各种专家往往除了一两种技术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基本的人文素养。“一位受到高级训练的电脑专家与那些最无知的人相比,似乎也不需要更多关于道德、政治与宗教的知识。”^⑥整全性知识的丧失,正是现代西方思想

①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80.

② Ibid., pp. 61, 380.

③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第 329 页。

④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21.

⑤ Ibid., p. 204.

⑥ Ibid., p. 59.

危机的根源,它使“我们用以解释世界的那些第一原则之间不一致与不相容,这是最严重的智识的危机,它导致了我们的文明的危机。”^①

在现代社会,只有大学能够为整全性的思考提供栖居之所。“它的目标在于非工具性地、为理性自身的目的运用理性,它提供一种环境,使主流意志在道德与实际力量上的优先性不至于威胁哲学的怀疑。而且,它是一座储藏伟大行为、伟大人物以及伟大思想的宝库,哲学的怀疑需要它们的滋养。”^②在大学里,“如果一位学生能够——当然这是最难的也是非常少见的——向后退一步,与他执著的物事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开始置疑他所爱的东西的最高价值,那么他就迈出了向哲学转化的最初的、也是最难的一步。”^③

要“为最好的思想在最高层次上对一种统一的自然观念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进行讨论做好准备”,^④大学教育必须是所谓的“通才教育”。当然,布鲁姆所说的通才教育并不像当前美国许多大学所做的那样,让学生尽可能地学习更多专业的知识。他所理解的“通才”,是那些对整全性的知识具有某种程度的理解和把握的知识精英。“所谓的通才并不是一个在诸多学科中自在的浏览者。像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这样的人自始至终的独

特兴趣都在于某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属于任何单一的领域,它们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善好这样的问题为前提。”^⑤因此,通才教育是一种心灵自由的教育,它主要致力于对过去的伟大思想的研究,其目的则是超越时代的偏见对人们心智的束缚。

为此,大学必须成为真正体现理性精神、拒绝虚伪的自由与平等、同时也拒绝权力斗争与市场经济逻辑的一片净土,成为自由民主社会人类的精神家园。布鲁姆强调,大学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独立,它不能简单地根据社会当下的需要服务社会,也不能没有原则地迎合大众。“当海德格尔加入德国大众——特别是大众中最年青的一部分,他认为他们已经无可逆转地投身于未来,并且让哲学服务于德国文化的时候,大学已经走近了它的末日。”^⑥一句话,大学必须享有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法律约束的自由,而是免于社会流俗影响、干预与控制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民主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

显而易见,现有的大学体制离布鲁姆的要求相去甚远,而且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和智识状态,原本就是大学教育的结果。因此,布鲁姆对大学的讨论,就非常类似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理想城邦的描述,那是一种也许永远不

①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p. 346-347.

② *Ibid.*, p. 249.

③ *Ibid.*, p. 71.

④ *Ibid.*, pp. 346-347.

⑤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第 320 页。

⑥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p. 311-312.

可能成为现实的乌托邦,但因为它阐明了事物的本质之所在,所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浓缩了布鲁姆基本的政治思想。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强调某种“自然的”等级,虽然这种差异与等级只建立在道德与理性,而非出身、金钱、权力、宗教或者种族的基础之上,从而与中国儒家传统中对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并无差别,但是,他仍然因此为自由主义者所诟病。因为自由主义最担心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分出高下,就是以道德和理性之名

对人进行强制。当然,考虑到布鲁姆恰是以自由主义最尖锐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的,所以用自由主义的逻辑反驳他并没有意义。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道德观念日益淡薄、物欲横流、权力与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同时也成为人们唯一的追求的社会,我们更需要的恐怕不是这些方面的自由,而是对我们自身的约束与净化,以及对整个社会前途的反思。这是布鲁姆的价值所在。他的思想不无偏激之处,但他实践了自己的信念,即“没有偏见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虚空。”^①

^①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43.